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作为自然法理学的古典政治 经济学：从哈奇逊、休谟到亚当·斯密

*Zuowei Ziran Falixue De
Gudian Zhengzhi Jingjixue*

吴红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作为自然法理学的古典政治 经济学：从哈奇逊、休谟到亚当·斯密

Zuowei Ziran Falixue De
Gudian Zhengzhi Jingjixue

吴红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自然法理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哈奇逊、休谟到亚当·斯密 / 吴红列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161-9304-4

I. ①作… II. ①吴… III. ①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756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宫京雷
责任编辑 梁剑琴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5千字
定 价 4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今天的经济学脱胎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后者的开创者是亚当·斯密。和启蒙时代的许多大思想家一样，亚当·斯密是以一个道德哲学家的意识、知识背景和研究技艺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并对其进行体系性解读和理论建构的。他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其道德理论在经济事务上的一个推演、一个应用。

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之所以如此关注和重视经济问题，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自身的重大关切。前者是指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对当时各奉行该主义的相关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错误的观念和理论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来予以清算和代替；后者则是指亚当·斯密自己在何为好社会，如何才能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基本上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法国之行，使得亚当·斯密意识到尽快创作《国富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原因，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密切联系亚当·斯密所处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要准确地理解他的道德哲学。

然而，我们见到最多的做法，是经济学家以现代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背景返回去解释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其结果，往往是轻则牵强附会，严重的则是误解和歪曲。比如，很多学者就是从现代经济学自利人的假设，从效用主义的行为特征等角度去解读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并将其推崇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最近几十年来，通过返回到原始文本，以及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情境，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表明对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启蒙思想家的简单解读是危险的，其结论不仅有可能流于片面和肤浅，而且往往似是而非，贻害读者。

亚当·斯密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他塑造了古典

经济学的基本气质，并且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奠定提供了学理支撑。这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个人事件，而是多个方面因素在一个时代聚集到了一起的产物。洪特和伊格拉惕耶夫编辑的《财富与德性》一书就是集中考察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历史之间关系的重要论文集。该书多篇论文的研究表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被创立并在最初阶段就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哈奇逊、休谟、亚当·斯密这些苏格兰启蒙思想运动的领袖们在特殊历史情境下产生的特殊问题意识。具体而言，这些思想家，无论彼此之间在知识背景、个人气质以及社会政治地位具有多大差异，都关心一个极为迫切而深刻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经济又相对落后的体系中，如何能够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进步，达到国富民强。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来源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祖国——苏格兰这样一个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1707年与经济上先进的英格兰实施合并这一历史变化。当然，这本书所涉及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发源的某一个历史侧面，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早期问题意识的时代特性。通过这一类的文献，我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的历史现实性和内部复杂性有一定的了解。这个方向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推进。

另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道德哲学方面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的话题。当我们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亚当·斯密身上时，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史的开放、演化和积累的特点就会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亚当·斯密无疑是一个具有很强原创力的思想家，但他留给历史的最为卓越的贡献则是把各种思想进展出色地整合成为一个统一而内部自洽的理论体系，完成了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最成功的综合。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断言，《国富论》中几乎所有的理论观点，都不是亚当·斯密的原创。在亚当·斯密之前，配第、达维南特、约翰·劳、康替龙、孟德维尔、魁奈、休谟、加利亚尼、斯图亚特、杜尔阁、布阿吉贝尔，已经在若干具体的方面提出了理解新的经济生活的概念和理论，开启了从重商主义经济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过渡，有的，如康替龙、杜尔阁和斯图亚特甚至写出了十分系统的著作，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具有亚当·斯密这样的伟大的理论综合力，当然也没有亚当·斯密这样的文字表达力。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理论任务，一方面是重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

史，即重新梳理和定义，在亚当·斯密之前有哪些人、在哪些方面提出了重大的理论创见；另一方面，则是要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解答，为什么是亚当·斯密而不是其他人成功地完成了理论综合。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亚当·斯密拥有如此强大的理论综合能力？

我的回答，是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正是这个道德哲学为其创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大厦打下了基础。众所周知，作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代表作的《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初版，比《国富论》早了17年。此后一直到1790年，31年的时间里，先后修改了五次，出了六版，一直到临终前几个月亚当·斯密还在为修订第六版而操劳。他花费在这部书上的精力，无疑大大超过了《国富论》。我认为，他如此重视《道德情操论》，是因为在内心中赋予其重大的理论使命，对其抱有历史性的期许。与《国富论》相比，《道德情操论》不仅理论上更加严谨完整，结构也更为合理。按照情感、正义、良心、效用、习俗、德性的叙述线路层层递进、逐步演绎和提升，宛如巴赫的协奏曲。吊诡的是，这部亚当·斯密花费毕生心血精心雕琢的伟大作品，却在亚当·斯密身后一两百年里知音寥寥。世人一度只识得作为《国富论》作者的亚当·斯密，完全不知道亚当·斯密作为伟大道德哲学家的本来面目。真可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道德情操论》承载了亚当·斯密巨大的学术雄心。正如他后来在《国富论》一书中所要做的那样，他试图对此前的道德哲学进行理论综合，创建一种新的道德哲学体系。

在这两部作品中，他都显示出了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在《国富论》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重商主义，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则坚决地反对简单功利主义。亚当·斯密试图超越他以前的那些道德哲学家的学术局限，形成更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新的道德哲学体系。所以，很难把亚当·斯密归诸道德理论传统中的哪一个学派或者哪一种主义。在《道德情操论》第七卷，即该书的最后一卷，亚当·斯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自己的理论与前人的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向以谦谦君子的形象示人的亚当·斯密，摇身一变，表现出当仁不让于师的学术气概和魄力。他全面地梳理了道德哲学史上那些著名的思想家的贡献，并把他自己与这些前辈做了比较，指出了各种异同点。他以自己的理论体系为支点，不仅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以及晚期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斯多葛学派进

行了评论，还对距他的时代较近的霍布斯、洛克、孟德维尔等重要人物进行了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还就自己与敬爱的老师哈奇逊、挚友休谟的学术联系和区别做了仔细的阐述。应该说，他对自己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创新和贡献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讨论了完全不同的主题，前者讨论道德问题，而后者讨论利益问题，前者以具有同情心的利他主义个体为理论演绎的出发点，后者则是以自利的理性人为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人们也都为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甚至是深刻矛盾所困惑。有人一度因此而怀疑并指责亚当·斯密剽窃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成果。随着《法学讲义》听课笔记被发现，这个怀疑才不攻自破。然而，即便如此，笼罩在亚当·斯密头上的疑云并未消退，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亚当·斯密问题”的困惑也未得到彻底的消除。不少人对如何解释这两部看似相互抵触的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都是一个视学术名声如生命的18世纪英国绅士的代表作这一点，束手无策。

我们需要寻求侦破这个“学术公案”的证据链。由于亚当·斯密去世前命人销毁了大量手稿，也似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与外界的通信也不多，所以，《道德情操论》《法学讲义》《国富论》这三个重要的原始文本，就成为后世解读亚当·斯密真实思想所能依据的仅有的可靠文字材料。

我的博士生吴红列是从法学转向经济思想史的，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自然法理学的多样性的、内在的关联，并进而考察这种自然法理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他的这本博士论文，尝试勾勒出自沙夫兹伯里开始至亚当·斯密，约一个世纪时间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学思想及其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影响。他力图从自然法理学的视角去审视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尝试对两者做融贯的解释和阐述。

在这本博士论文中，作者把大量的篇幅用以考察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合宜性概念，将其作为连接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桥梁。他的研究力图表明，亚当·斯密的合宜性概念是受自然法影响而形成的，具有某种深刻的自然法特质；基于这个认识，他尝试通过合宜性概念，更好地理解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与价格理论、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他认为，对于把握工资、利息、地租这些重要经济变量以

及彼此之间的连接关系而言，合宜性概念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指导作用。总之，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其合宜性理论的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演，是他在理解经济事务方面的一个具体应用。

吴红列对这个基本认识并没有停留在猜想和假说上，而是广泛地搜集材料，对其做了力所能及的梳理、考订和求证。他的结论是否成立，自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学术评论。不过，据我所知，在国内学术界，他在这个主题上的发掘是较为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具有学术价值。当然，本书作为经济思想史的作品，在使用材料的全面性以及论证的深度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科林伍德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似乎也不例外，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物、事件、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此后历史进程的起点，它通过19世纪而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联结。不仅如此，对中国这样处在历史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所面对的问题，仍然具有启蒙时代曾经直面的那些问题的某种特性，就此而言，说弄清楚了启蒙时代的事情，也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下的现实，把握未来历史演变的方向和机理。

寻求启蒙时代道德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经济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简单的历史研究课题，也不应该视其为纯粹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关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理论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以及经济学如何与现时代形成对话与互动，经济学家该如何回应历史的挑战等重大问题。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是有助于加深学术界在以上相关问题上的思考的。

是为序。

罗卫东

2016年9月

序 二

当一个学科在其发展中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时，它往往被认为已经“变得成熟”，这种独立性有时也被看作该学科取得进步的一个标志。现代科学的产生、发展和分化就示范了这样一种思想路径：在古典时期，科学作为对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一种思辨性研究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而，自从17世纪以来，笛卡尔的哲学变革使得将人类心灵及其可能含义从物理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可能，实验方法的兴起让科学具有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科学也因此而成为对物理世界的一种“客观的”、完全摆脱了人类情感投射的研究。现代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逐渐具有的这种独立地位，当客观性、中立性和超然性之类的观念已成为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时，它们也逐渐成为其他希望成为“科学”的学科努力争取的理想，自然科学被认为具有那种权威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很多学科顶礼膜拜的榜样。经济学就像哲学一样同属古老的学科：只要有了家庭和其他具有一定组织的社会生活，人类对于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经济活动的管理甚至比他们对外在世界的纯然好奇要来得早。而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兴起，市场经济也似乎变成了一种自成一体、有着自身的规律且在某种程度上神妙莫测的东西——用经济学中已变成陈词滥调的一个术语来说，人类的经济生活宛如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支配，就像整个宇宙被一个无形且无比强大的上帝所支配。当人们试图从纯粹理论的视角来理解那只“无形的手”如何运作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经济学就应运而生，而在经济学将自身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现代学术产业的职业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数理科学方法在经济分析领域中的引入更加助长了这种趋势。于是人们越来越相信经济学那自成一体的独立地位，甚至于认为在现实的人类生活中建构出来的经济模型能够独立于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而得以应用。

我不是在否认经济学家在其纯粹的学理研究中完全无视了人类应当如何生活或者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当如何加以组织之类的根本问题：当代经济学文献在充斥着交换、契约、博弈、平衡、效用最大化之类的术语的同时也不乏福利、发展、繁荣、公平或正义之类的措辞。我所要强调的是，在当代世界，当人类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物质生活和提高了消费水平，并以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垄断经济以及全球化等多种面貌表现出来时，同样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和越演越烈的经济不平等却层出不穷，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论是在国内层面上还是在全球层面上，也都明显可见且影响深远。如果这一切都现实地存在且难以扭转，就像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看到的那样，那就表明我们或者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的根本目的的思考可能在什么地方出了错。那只“无形的手”被认为魔法般地支配着人类的经济生活，而为了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做出各种关于市场的假定，其中一些假定已被证明是高度成问题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经济活动的目的及其在人类生活中应当占据的地位。当现代经济学取得了其独立地位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将自身从对人类条件和人类生活的其他重要思考中分离开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结果，因为尽管经济学有自己的价值预设，但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任何简单化的抽象、任何脱离了对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考虑而提出的理想都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在当代世界中，与人类生活的大多数其他领域相比，经济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入，因此，如果一种经济理论设想不当，它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果也就更加危险。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被认为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设想为完全受自我利益的驱动，而市场经济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企业乃至作为一种经济体的国家）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自我利益、满足自己偏好的竞技场。这已被视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天然”法则，它左右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商品和价值的分配，于是，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说法，在市场经济中，理性行为是按照两种方式来定义的：一是将理性行为理解为选择的内在一致性，二是将合理性认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Amartya Sen,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 1987, p. 12.）。正如阿玛蒂亚·森明确地意识到的，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按照自我利益来解释合理性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数个世纪以来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点。一旦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已被确立为现代经济学的

第一原则，经济学家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试图按照一些假定来全面说明人类行为，其中就包括最大化行为、市场平衡以及稳定的偏好等假定。亚当·斯密对经济生活做出的预设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马歇尔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凯恩斯那里得以继承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在市场内部来寻求驱动市场的力量；另外，尽管马克思、维布伦以及熊彼特等人对这些力量提出了更加广泛的理解，但他们也是沿着大致的思路来理解经济市场。不可否认，这些承载着价值的假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经济学家理解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于18世纪的市场来说或许是高度合理的。但是，三番五次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表明，依照这些假定来运作的市场经济必定在某个地方出了错。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按照阿玛蒂亚·森的判断，现代经济理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反伦理主义”（anti-ethicalism）：现代经济理论在历史上是通过在其推理中排除各种形式的伦理考虑来维护自身。只要回想一下经济学自身的缘起，就会发现这种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当经济学的雏形在古典世界中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本来就被设想为伦理学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分支，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对“好城邦”的设想中来关注经济生活的本质——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篇》、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来讨论经济问题。不管他们两人如何具体地设想正义，正义都是一个政治社会的首要关注，人类生活中所有其他东西都要围绕这个核心论题来加以组织和设想。当然，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化早在古典世界中就出现了，而正义也是被设想为处理二者之间张力的一种主要方式，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正义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只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这种分化的趋势变得日益突出。西季威克在其《伦理学方法》中已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实践理性的二元论”，即利己主义和普遍功利主义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在这里我们无须去追究这种对立是如何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而产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助长这种分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在埃奇沃思（F. Y. Edgeworth）对西季威克伦理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和发展中，经济利益的演算已经从伦理考虑中游离出来，行为只有在摆脱了自私的动机的时候才被认为是“道德的”。这个思想不仅促进了伦理学和经济学的两分，而且也提出了一种与古典世

界的伦理观念不同的伦理思想，将道德行为完全理解为无私的行为，经济学作为一个只关注“利益计算”的领域而被隔离出来。于是，不管人性和人类条件是否必然导致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分化和对立，经济领域都被认为完全不受乃至不应受伦理考虑的支配，而尽管各种形式的经济实体有时候被认为应当承担社会性的伦理责任，这种责任也被认为是一种原则上能够游离于市场本身的东西，是一种“分外之责”，宛如一个一夜暴富的人对穷人所实施的善举。

在这里我们无须详细列举这种分化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得不追究它在人类生活中所造就的那幅阴暗图景的根源。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英国思想家的塑造下发展起来的，有趣的是，也主要是英国思想家对现代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性的缺陷做出了最深刻的反思。休谟并不否认人性中有自私或自我关注的一面，但是，甚至当他承认自我利益是现代贸易之发动机的时候，他也用前所未有的洞察力认识到自我利益也是贸易的最大障碍，因为以自我利益的追求为核心动机的现代贸易无法完全废除人性中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一种既不以利益的考量为基础，也不受其左右的人类关系，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友爱。事实上，在休谟看来，这种友爱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将利益的计算完全驱逐出去：

值得注意的是，最能使一个仁爱的人受到感动的，莫过于在爱或友爱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体贴，在这里，对于朋友所关心的细小事情，一个人体贴入微，并愿意为之而牺牲自己的重大利益。这种体贴对社会的影响不大，因为它们让我们去关心一些最琐碎的事情。但是，这种关心越是细微，那种体贴也就越动人，并且证明能够具有这种体贴的人具有最高的价值。（休谟：《人性论》，第604页）

休谟在这里并未直接谈到友情或友爱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或者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但是这段话显然可以被理解为对那种将自我利益设想为行动的唯一动机的思想观念的纠正或反叛：正是因为一位朋友能够无视“自己的重大利益”，自我利益的逻辑才不适用于人类生活中一种意义深远的情感——各种形式的友情或友爱。实际上，只要我们同意或承认两个基本事实，休谟的这段话就具有格外重要的含义：其一，即便经济生活的一个目的，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就在于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或生活资

料，它也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尽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取决于一种公平或正义的社会合作体制的存在，而公平或正义，正如近来很多学者已经表明的，并不只是取决于那种按照契约论的观念来设想的、对社会生产的物品或相应报酬的公正分配，而且在根本上也取决于维系这种合作体制的一些重要情感，例如对共同命运的分享和承担以及维护这种情感的其他社会情感。更不用说，此类情感的扭曲或肢解会直接威胁一种公正和稳定的社会合作体制，比如说，如果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进而致使一些人失去生存的基本资源，那么社会势必会陷入大规模的混乱和冲突并最终解体。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导致了这样的恶果。

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正是卢梭首先系统地认识到了自我利益的动机所导致的种种社会恶果，因此发出了通过教育来重塑现代社会中因为对自我利益的不加限制的追求而已经变得腐化的人性的呼声。不管我们如何解释卢梭对于理想的政治社会的设想，在把人类不平等和社会腐化的根源追溯到自私自利和爱慕虚荣的动机这一点上，他肯定是正确的。根本的问题显然并不在于人们不应该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提高国民财富，而是在于在维护人们所珍惜的基本的社会情感、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以及保证市场公正的前提下来发展经济。我们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市场从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中割裂开来，将它看作一种自成一体、完全由各种形式的自我利益来支配的东西。换言之，为了彻底解决卢梭在自己对现代性的诊断中所鉴定出来的那个根本问题，我们需要在全面审视人性和人类条件的基础上、按照对人类幸福和人类命运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考虑来理解和设想人类经济生活的目的和归宿。

有趣的是，与所谓的“卢梭问题”相对应，也有一个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假若我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亚当·斯密的解释，我们就会把他理解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奠基者和代言人，并在这种解释的鼓舞下认为他倡导全盘私有化，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系统以及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因此，我们可能也会把自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因于他，将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无冕之王”或者一位丧失了人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然而，假若自由市场经济的确“缺乏人性”，亚当·斯密是否会认为“就让它如此吧”？这个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就是所谓的“亚

当·斯密问题”，其中的核心争论关系到这样一些问题：亚当·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否表达了对人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理解？如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人性的理解看似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说明了这种“二元性”？在发展自己对人性的理解时，亚当·斯密是否采用了一种二元论的方法论？这些是亚当·斯密学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些评论家已经试图纠正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仅仅是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的传统解释，认为亚当·斯密对人性和相关问题的思考包含了两个相互补充的要素：一方面是他对商业社会中的人类处境提出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描述性论述，另一方面是他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更加一般的规范性理解。尽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是利用一种功利主义的自利和自爱概念来分析商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利用了自己的同情学说来说明人类如何走出纯粹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困境和问题。亚当·斯密显然认识到了人类必定生活在自利（或自爱）和彼此同情（*mutual sympathy*）之间的永恒张力中，认为二者都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情感，因此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对立并不是可以轻易消除的。但是，作为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的亚当·斯密显然已经为如何缓解这种张力做出了一番细致的哲学思考，将正义和美德牢固地树立为任何值得向往的人类社会必须加以坚持和守望的支柱。而作为一位古典学者，亚当·斯密也从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中去寻求对理想的人类生活的一种合理设想。他从道德、政治以及自然法理学等角度对经济生活的本质所做的系统思考，对于反思当今的人类状况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目的和归宿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之所以如此，至少是因为当代经济学家出于各种缘由而倾向于忽视经济学和经济生活的伦理维度。

在这部专著中，吴红列博士深入剖析了现代经济学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冲击下如何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其本来就具有且应当具有的伦理学和法理学基础中被割裂出来，进而阐明了现代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和现实问题，因此本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来得很及时。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现代世界的形成及其面临的问题所做的批判性反思远比欧洲同时代其他启蒙运动思想家要深刻得多，而在这部著作中，通过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思想背景，作者深入细致地重构和分析了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伦理、政治和法学基础，从而为理解和解决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格外有力的思想框架。这部著作中体

现出来的跨学科研究视角本身就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本书论证翔实、行文优雅，而且很好地实现了哲学分析和历史叙述的有机结合。鉴于此，尽管我自己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一无所知，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也知之甚少，我还是很乐意应作者之邀为该书撰写一个粗浅的序言，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定会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建立一个公正而人道的市场经济做出一个有益的贡献，而这显然是我们目前最为缺乏的。

徐向东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6年8月

Abstract

There are very close links between the emergenc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On the one hand, economics has tendency of de-moralization and tend to get more and more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 since nineteenth-century, the elements of ethics and jurisprudence to classic political economy have been igno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scientism and empiricism till today.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self-satisfied economic hypotheses without the foundation on ethics, law and psychology still haven't come into being, and if economics can't face to the moral dilemma, what difficulties could it deal with? While we oppugn and criticize the moral absence of economics and its departure from the real world, we should trace back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give reflections of all kinds of problems that those Scottish thinkers had discussed and debated in eighteenth-century, which is the age for the emergence and formation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finally, to seek for the possibility of re-thinking economics by exploring the important theories which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such as David Hume, Adam Smith, explained in their major works.

In fact, the formation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volved, at least, other two important resources besides economic thought: natural law prevailed in European continent 17th to 18th century, and British moral philosophy. However, the arguments and opinions haven't attained corresponding regards and studies for a long time. For this reason, This doctoral thesis attempts to do some research on natural jurisprudence and re-read the books of Gershom Carmichael, Francis Hutcheson, and David Hume in this discours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suggested by Adam Smith is a doctrine based on the human science, and

his economic theory is deeply implanted in the context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it is upon this whole system that Smith interprets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blems by the theory of sympathy-for Smith, "propriety" is a key word. Only in the context of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o interpret Smith, can we fully understand what unique and creative contributions Smith and his contemporary made in the times of social transition, which is also good to better understand or grasp the essence and clues of Smith's works, especially his jobs, i. e. links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ral philosophy.

This discourse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Chapter One, the Introduction, comments the status quo of studies of Adam Smith and Scottish Enlightenment by the scholars abroad and hom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study Smith's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jurisprudence, and then, the basic thoughts are put forwarded for this research.

Chapter Two describes the formation of Scottish natur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natural law in Scotland, and illustrates the sequence of thought from S. Pufendorf, G. Carmichael to F. Hutcheson. Carmichael is the first one who introduced natural law into moral philosophy dur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and began to teach natural jurisprudence in Scotland. Hutcheson, who followed Carmichael and carried on this subject, reconciled the civic virtue for natural rights, and gave reflections of economic matters in the frame of natural law of Pufendorf. All this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 formation of Smith's economic thought.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Hume's thought on natural law, and puts emphasis on his criticism. Hume argued definitely that man hadn't had the natural "virtual" sociability, rights and duties didn't derive from nature, nor the intrinsic moral sense, but the consequences of custom. For Hume, utility is the reason why natural justice happened, and utility is the mere resource of morality. This criticism on natural law by Hume results in a great change to Scottish sequences of natural jurisprudence, and influences Smith's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doctrine of natural law and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civil society, which are represented in his political economy.